

黄裳像
丁聪绘

书生黄裳： 一部有味奇书

文 / 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名士风流

黄裳祖籍山东益都(今青州市),原名容鼎昌——今天知道这个名字的可能已经不多见了。

先生作文所用笔名颇多,如吴痴、朱慧深、沈意之、勉仲、一知等等不一而足,但独对“黄裳”二字情有独钟。据说此名与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有关,黄裳与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江既是同学又是挚友,传言他追求黄宗英,结果被婉拒,为了表示自己的痴情,遂取“黄宗英衣裳”之意,用了这个笔名。当时黄宗英在上海当演员,因主演喜剧《甜姐儿》而知名,喜欢她的观众都叫她“甜姐儿”。这时黄裳正痴迷收藏旧书,买了一册不易搜寻的《痴婆子传》。后来这事儿不知怎么被钱钟书知道了,专门写了“遍求善本痴婆子,难得佳人甜姐儿”一联相赠,给后人留下了一段文坛趣话。

这幅对联被黄裳写入散文《断简零篇室忆》,后来他又觅得钱钟书原笺,寄给为其整理、编选书信的学者李辉。黄裳在信中说:“偶检得钱默存(钱钟书字默存)旧信一纸,系一九四九或一九五零年作,前未发表。因兄长文曾提到此事,得此为证,良佳。《书简》前或可增原迹印本数通,此亦可增入,可增兴趣。”

关于此事还有另外一说。据黄宗江自述,说是当年他爱演戏,黄裳对他唱戏得有个艺名,于是便自作主张地代他起名“黄裳”。但黄宗江觉得这个名字脂粉气太浓,不如自己的名字好,没用,没想到后来却被黄裳自用了,并且用了一生。对于这些说法,黄裳都是一笑了之,未置可否——但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前说,因为那才是黄裳所迷恋的传统文人的风流情怀,也是我心中黄裳的做派。

知名作家和报人李辉关注和研究黄裳多年,对黄裳的文人气和名士气知之甚深。他在文章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:

1943年黄裳旅居成都,2月15日这一天他写了这样一首诗:“无端姿媚泥人生,琥珀调羹手自擎。知是殷勤知是惜,此情如水不分明。”诗后的跋这样写道:“时借寓春熙路上,天井中有芭蕉甚大。夜半闻游女歌声,不能成寐。”活脱一个可爱的青年,竟为院外女子的歌声而失眠,并将这一体验变成了诗。

可惜,这种率真和浪漫今天看来似乎已成为一种久远的情怀了。

才子情怀

熟悉黄裳的人都知道,黄裳是个“多面圣手”,当记者,写文章,搞翻译,玩收藏,样样精通。黄裳与汪曾祺、黄永玉交厚,1947年前后,汪曾祺在上海致远中学教书,黄永玉在闵行区中学教书,每逢周末,两人就相约去找黄裳。黄永玉在文章中回忆说:

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、十点钟,星期天的一整天,那一年多时间,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。还有那活生生的钱!我跟曾祺哪里有钱?吃饭、喝咖啡、看电影、坐出租车、电车、公共汽车,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。不是不想,不是视若无睹,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。几十年回忆起来,几乎如老酒一般,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。

黄裳那时候的经济收入:文汇编副刊、中兴轮船高级干部、写文章、给一个考大学的青年补习数学、翻译威尔斯的《莫洛博士岛》、出几本散文集,还有什么收入?伺候年老的妈妈,住房及水电杂费,还有类乎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……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。

对于三人在沪上的这段交往,从黄裳的《故人书简》中亦可得印证:“认识曾祺,大约是在1947至1948年顷,在巴金家里。那里经常有萧珊西南联大的同学出入,这样就认识了,很快成了熟人。常在一起到小店去喝酒,到DD'S去吃咖啡,海阔天空地神聊。一起玩的还有黄永玉,一个写小说的,一个刻木刻、画画的,都是才气纵横但穷得叮当响的‘文化人’。”

黄永玉文中提到的长篇小说《莫洛博士岛》本是黄裳的老师

李林翻译,李林就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,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师长和才华横溢的翻译家,抗战晚期不幸去世。当时《莫洛博士岛》只翻译了开头部分,抗战胜利后,黄裳将小说完成,1948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,署名“李林、黄裳”。关于这本小说,黄裳在《题跋一束》中这样说到:“此为续成先师李林先生未竟遗译。时余在上海,文汇报已封门,闭门索居成此,遂得列入‘译文丛书’中。此丛书第一种为鲁迅先生译书,余最为尊重。不意十年后乃能以拙劣之译本厕身其中,以为绝大光荣。”

黄裳的翻译生涯由此起步。黄裳作文,最为拿手的是读书、怀人文字,这些文字“常举史事,不离现实,笔锋带着情感,虽然落墨不多,而鞭策奇重”,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快感——而翻译对于黄裳来讲,只是副业而已。但就是玩票儿,黄裳也做出了大成就,后来他又出版了多种译作,《猎人笔记》就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一部。

书人书事

何为书人?读过一本小书,其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书人者,以书维生之人也。醒即抓书,如闲读书,等车看书,上班编书,下班买书,灯下找书翻书写书。”黄裳就是这样的书人。

黄裳一生著作等身,其文化散文也是独步天下——之所以如此,与他手不释卷勤于读书是密不可分的。《文汇报》知名编辑刘绪源对先生读书之多深有体会:“黄裳看书真多,每次去他家,总是在看书,桌上,沙发上,茶几上,都摊着几本看了一半的书。过去他当编辑,每天中午要上书店,自称是‘书店巡视员’。后来年纪大了,他也一直要买书。我就替他买过许多书,书的种类非常杂,品位很高。”现代文学史学者陈子善则对黄裳的书斋印象颇深:“我还记得他没搬家之前,那个房子比较小,他的饭厅、客厅里全部是书,都堆到了天花板,所以不论哪里都是他的书房。但是他把书整理得很好,都拿牛皮纸包着保护着,是非常爱书的人。”

黄裳藏书无数,而他最为得意的一本藏书,是他自己的《锦帆集外》。这本书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,后来他自己印了唯一的一部线装本,自己留着把玩——自己写,自己印,自己藏,真玩家也!

黄裳收藏古书眼光老辣,他们那一代人普遍轻视明清刻本,黄裳称得上是第一个重视清代刻本的收藏家,他的那部《清代版刻一隅》就是证明。黄裳发掘了很多工艺精美的清代版刻,也写了一些文章。他不仅是藏书家,还是版本学家,出过许多文集,介绍他的藏书,从怎么得到的到版本考证等等,这些书都值得后人一读。文革期间,黄裳精心收藏的这些书籍全被抄没,据说被抄去的书“仅属国家二类古籍的就有828种,2160册”。黄裳后来在《书祭》一文中无可奈何地叹息道:“人们花了一个整天又一个上午,总算把我全部印有黑字的本本全部运走了。”

黄裳不仅藏书,还喜收藏名人手迹。1940年代末期,黄裳写信向远在北平的沈从文先生索字。沈先生是个极为认真的人,接到黄的来信后,先后三次寄来了自己的书法作品,其中最后寄的长幅十分珍贵,系沈从文、张充和和杨振声三人合写,右下方题记云“霁清轩中三人同书”。黄裳最欣赏张充和,旋托好友靳以向张讨字。但此后不久,江山易手,张充和随夫君赴美,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三十多年后,著名诗人和学者卞之琳访美见到张充和,谈及旧雨新知,张翻出当年靳以代黄裳求字的信,旧情拥怀,挥笔为黄裳书写《归去来辞》,并附言道愧:“附上拙书一幅,想来你已忘记此事,因靳以四九年的信尚在,非了此心愿不可。”张充这纸《归去来辞》让黄裳“真是说不出什么滋味,痴坐了许久”,随后写下了《宿诺》一文,记下了这段颇为传奇的因缘。

收官之际,想起了不久前刚刚离世的周汝昌老先生。周汝昌与黄裳是同窗至交,两人相逢南开,因半部红楼梦结缘一世。少年黄裳在周汝昌眼里是“大眼,长睫毛,闪闪有神,流露着聪慧之气”,而周在黄裳眼里则是“细长身材,清疏眉眼,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气”。我想,两位长者今年相约一起远行,天堂之旅该不会寂寞了。■

著名报人、散文大家黄裳(1919-2012)近日驾鹤归山,浦江之滨又走了一位文化老人。众所周知,黄裳先生学识渊博,下笔成趣,他的文字记山川、品人物、论时政、评戏剧、说版本、话藏书,浅唱低吟,轻歌曼舞,平淡琐细之中有真知灼见,酣畅淋漓之中见深厚质朴——常常纳闷,他那支笔究竟是怎样练成的?

黄裳一生与书结缘,读书,品书,写书,译书,藏书。知之者言,黄裳其人其实就是一部书,一部许多人都爱读的书,一部淡定从容有风景有识见有性情的奇书。



黄裳著作《过去的足迹》书影



才子黄裳